

他乡与故乡：美国华人基督徒与公理会在华南的传教活动

赵殿红 袁 琴

【摘要】19世纪末,越来越多的广东人前往美国加州务工。美国各大教会竭力向华工传教,并期望通过他们将基督教影响带回广东家乡,其中尤以公理会的工作最为显著。美国广东籍基督徒请求美国公理会派遣传教士前往他们的家乡开展传教事业,进而形成以广州、香港为中心,以四邑、香山、阳江、顺德、客家等地区为支撑的传教格局。在此过程中,美国华人基督徒通过筹款资助建设教堂、人力物力支持学校教育、亲身传道于父老乡亲、主动发起和管理自立教会、组织建立各种传教协会等途径,支持家乡的传教工作,从而形成了传教士、美国华人基督徒与广东家乡之间多向互动的传教网络。美国华人基督徒在接受基督教教义的同时,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带入美国社会,同时将基督教文化和近代西方思想理念传回祖国和家乡,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典型的“双向传播者”。

【关键词】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华人;华南

【作者简介】赵殿红,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唐廷枢研究中心研究员;袁琴,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20.8.124~133

一、引言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基督教各差会大量派遣传教士来到中国,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对华传教事业。其对华传教格局与安排,不仅体现在直接来华传教,还特别注意在美国华人尤其是华工中间传教,并通过这些华人基督徒,向其家乡进行“逆向传播”。如此,美国对华传教活动的主客体以及传教路径逐渐发展出以下趋势:传教士与中国本土的单一主客体关系演变为传教士、美国华人基督徒与祖国家乡之间的多向互动关系;单向传教路径则演变为一种信息和资源循环流通的传教互动网络。其间,美国华人基督徒的主体性地位日渐突显,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传教力量。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重心,已从过去侧重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转向

对本土教会发展与演变的探讨。但无论重心如何,对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海外华人基督徒这一群体的研究仍有较大空间。尤其是对西方传教士、本地教会、海外华人基督徒这三者之间的多向互动关系,以及华人基督徒在传教士与祖国家乡之间乃至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相关研究还比较少见。

赵晓阳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以新西兰华工为例分析了他们与广东家乡的传教互动。但她认为:“旅居新西兰的淘金华工信仰了基督教,并由此引发新西兰基督教长老会的海外传教热情和拓展行动,确定将淘金华工的广东故乡作为他们的海外传教新区域,‘回向性’开拓传教地区,却是中国基督教史上惟一的一例。”^①新西兰基督教长老会的海外传教热情是否由淘金华工信仰基督教而引发姑且不

论,但将广东作为目标区域进行“回向性”传教,新西兰长老会的事例显然并非独有。实际上,从淘金华工大量移民美国开始,不少教会就萌生了将基督教影响通过这些华工尤其是华人基督徒拓展至他们家乡的想法。例如,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就设计了向旧金山华人的家乡的传教计划并付诸实施。^②而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先是积极在美国华人中间传教,随后委派传教士专门前往华南地区传教,其传教历程和贡献在基督教传教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更是不可小觑。而在此过程中,美国华人基督徒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通过对美国华人基督徒与公理会的特殊关系以及华人基督徒主动推动并大力帮助公理会传教士到华南地区传教的整个过程进行考察,分析清末民初美国华人基督徒这一特殊群体在基督教传播网络中的角色,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双向传播者”的作用,进一步诠释中国基督教史上这一特别面相,丰富和深化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在意蕴。

二、华人在美国结缘公理会

19世纪中叶以来,大批中国南方居民前往美国,加入“淘金潮”大军。从移民的数量来看,1850年只有700多人,到1860年猛增到34933人;1870年,美国华人数量有64199人,到1880年更激增至105465人。^③从移民的地域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美国西部太平洋沿岸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从移民的来源地来看,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以广东为最多。广东的移民则主要来自三邑南番顺地区(南海、番禺、顺德)、四邑地区(新宁、开平、新会、恩平)、广州、香山以及客家等地。1850-1880年30年间,广东四邑地区的华人移民比重稳居首位且直线上升,其他地区的移民比重则逐渐下降。

当然,华人移民美国的过程并非平稳顺畅,而是深受中美两国政治、经济环境因素变化的影响而曲折沉浮。伴随着持续不断、此起彼伏的排华浪潮,美

国于1882年出台排华法案,以阻止华人移民的进程。不过,这扇大门毕竟没有完全关闭。1882-1943年间,在美国的华人人口先是减少,然后是少量增加。总的来看变化不大,人口在10万上下。^④事实上,19世纪8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广东人前往美国务工,他们到达加州、纽约、波士顿等地,而四邑地区的华人仍然占据较大比例。同时,中国的商人、留学生以及美国出生的华裔的数量也逐渐增长,他们所受到的西式教育使其较半个世纪前的华人前辈们更容易接受当地社会主流文化,所从事的职业也由过去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向各行各业,其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

身处异国他乡的数目可观的华人群体,很快引起了美国基督教会的注意。各大教派不遗余力地向这些华人传教,同时寄希望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来返回家乡,可以将基督教信仰在中国进行更深层次的传播;他们还积极培养华人同工,以使其成为在华传教的得力助手。对背井离乡初到美国的华人来说,因为他们既不是白种人,又不是基督教徒,受美国排华情绪的影响,很难立足于当地社会,在身份重建过程中具有天然的致命弱点。华人无论是出于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渴望,还是适应族裔认同的需要,参加当地宗教活动都不失为两全之策。于是,皈依基督教的华人不在少数,有些甚至成为牧师或其他教会服务人员。随着加入基督教的华人越来越多,1853年,长老会牧师施慧廉(William Speer)在旧金山成立美国华人基督教会,被认为是美国传教士对华人移民传教活动的标志性开端。其后,有11个新教教派先后加入到向美国华人移民传教的行列,其中长老会、浸信会、美以美会、公理会和圣公会五个教派起了主导作用,取得的成效也最为显著。^⑤

公理会诞生于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格兰,1620年,一批流亡荷兰的公理会信徒乘“五月花”号帆船驶抵北美,由此传入北美殖民地。18世纪末19世纪初,公理会大力开展海外传教,1795年建立伦敦传教协会,1836年又成立“殖民地(英联邦)传

教协会”,传教于非洲、印度、中国和巴布亚等地。19世纪中叶开始,公理会的中心逐渐转到美国。该会信仰以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为基础,对信条的态度较为灵活和宽容。公理会向华人传教,主要通过美国传教士协会(The American Missionary Association)进行。该协会于1846年由东海岸公理会教徒成立,最初主要的传教对象是美国内战后的黑人和印第安人,而当50年代华工大量涌入美国后,他们便致力于向华人传教。1876年,美国传教士协会和加拿大公理会在旧金山成立加州华人传教会(California Chinese Mission),长期投身于华人传教工作的庞德(William C. Pond)牧师担任该会秘书。此后,美国传教士协会在加州华人中的工作通过加州华人传教会进行。作为一个独立的华人传教组织,除了正常的布道工作外,加州华人传教会还建立华人主日学校,同时重视在妇女儿童中间开展传教活动。通过庞德牧师的持续努力,该会面向加州华人的传教工作成果颇丰。至1904年,该会在加州总计开办40所面向华人的教会学校,近2万名中国人接触了基督教,1700多人成为基督徒。^⑥此外,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公理会还在奥克兰、檀香山、山谷城、洛杉矶等地成立传教会,在华人中间传播福音。^⑦

每年,加州都会有一些华人基督徒返回自己的家乡。他们当中有些人致力于在家乡开展传教活动,开办了一些传教点、小教堂或教会学校。他们同时需要与美国的教会保持联络,以获得持续不断的支持。而留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除了在物质上帮助家乡外,更希望在精神上使家乡人民接受洗礼,不断向美国传教士协会提出请求,希望协会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传教机构,这种诉求与公理会的海外传教需求不谋而合。^⑧而其时的美国传教士协会在加州华人中间的传教任务已经很繁重,无暇顾及更多的海外拓展工作,于是便向美部会反映了华人信徒们的诉求。美部会全称为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成立于1810年,是美国基督教的一个海外传

教机构,也是紧随伦敦会和荷兰传教会之后,第一个进入中国的美国差会。美部会成立时得到公理会、长老会、美国归正会等教派的支持。后来,公理会以外的教派陆续退出,美部会便成为公理会在华的代表。公理会对华传教事业实际上通过美部会开展和实施,故美部会在华也被称作美国公理会。

美国公理会在华南地区的早期传教事业,始于1830年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牧师来华,但在60年代后因传教重心北移而一度中断。鉴于上述美国传教士协会代表华人基督徒所提出的在中国建立传教会的请求,美国公理会于1882年投票决定再次派遣传教士到华南开展工作。当时的香港已经开埠数十年,且与广东毗邻,遂将教会总堂设于香港,1883年派遣刚在旧金山被按立为牧师的喜嘉理(Charles Robert Hager)至华,重振美国公理会华南传教事业,客观上亦为美国华人信徒参与广东家乡的传教事业创造了先决条件。

三、美国公理会复兴华南传教事业

根据王立新关于美国在华传教运动的时间段划分,从1830年到20世纪初,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准备和开创阶段(19世纪30至60年代)、缓慢发展阶段(19世纪60至80年代)、迅速发展阶段(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⑨美国公理会再次开展华南传教工作,大致处于上述的“迅速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华南地区的基督教传教事业非常引人注目。公理会在加州华人当中获得不俗的传教成绩,并成功地使在美华人基督徒参与到复兴华南传教事业的工作当中。华人基督徒对祖国家乡的情感和对传教事业的热忱,贯穿于美国公理会华南传教活动的全过程,为传教事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支撑。

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公理会在华南的传教事业亦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艰难草创期(1883-1890)。喜嘉理牧师在香港落脚之后,开办了英语夜校和主日学校,访问新宁、香山、阳江

等周边地区。面对当地民众对基督教的不友善甚至敌意,他孤军奋战,通过七年的耕耘和努力,初步打开了美国公理会在华南传教的新局面。孙中山即是在1884年5月4日,经由喜嘉理牧师洗礼为基督徒。二是稳定成长期(1891-1910)。香港传道团更名为华南传道团,传教中心由香港改为广州。美国公理会增派戴勒(John R. Taylor)夫妇及伍赖信(Charles A. Nelson)夫妇前来协助。喜嘉理和夫人玛丽(Mrs. Marie von Rausch Hager)驻守香港,伍赖信夫妇驻守广州。此后,以香港和广州为主线并向广东腹地辐射扩展的传教体系逐步形成并趋于稳定。三是纵深发展期(1911-1930)。1910年,喜嘉理因健康原因返回美国,结束了他在中国长达27年的传教工作,华南传道团转由伍赖信夫妇负责。随着中国民族意识的增强,美国公理会先将在香港所持财产的股份转卖给当地已经自立的教堂,后将在华南的整个传教事业转给了当地自立教会,这标志着美国公理会华南传教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美国公理会在初期将传教总堂设在香港,主要是为了服务往返加州的广东华人。广东是当时中国18个省中最富饶的省份,广东人富于进取精神和商业精神,出国务工的人员很多。美国公理会深知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将会影响整个中国,以至后来将总堂改设于广州,更有利于传教事业的进一步拓展,尤其是向广东腹地的延伸。在香港、广州两个总堂的辐射之下,美国公理会成功地将传教活动拓展到了四邑、香山、阳江、顺德、客家等周边地区。其中,四邑成为主要阵地,伍赖信描述:“至1907年,美国公理会在四邑所面向的人口大约为200万人,在广州和香山约为25万人。事实上,美国公理会选择的分堂点距离总堂较远,最近的约60英里,最远的约200英里。”^⑩分堂点距总堂较远,原本并不利于传教工作的开展,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广州附近的乡村已被其他差会占领以外,更重要的是大量美国华人的家庭分布在这些地区。从这里走出去的美国华人信徒,能够以他们的影响力感化家乡的亲人和朋友,以此增

强基督教传播的效果。

吴义雄认为,19世纪前期传教士形成的中国观,对19世纪后期乃至20世纪前期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仍有深刻的影响。^⑪因此,相较于美国公理会早期在华南的传教方式而言,它于清末民初所采取的传教方式虽然因应时势略有调整,但大体上仍与早期保持一致。美国公理会于此阶段在华南的传教活动主要通过旅行布道、兜售圣经、建立教堂、兴办学校、医疗传教、印刷书籍等方式进行。除此之外,还注入了自立教会、联合传教以及华人信徒回传福音等一些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元素。

除了在香港和广州建立总堂外,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还深入广东腹地旅行传教,散发圣经,在当地建立教堂。喜嘉理于1883年首先访问了四邑的新宁,他在琼斯(David D. Jones)牧师的陪同下,从香港坐船进入新宁县的广海。当时新宁县的城里不允许传教士购买或租用做礼拜的房屋,传教活动难以开展。^⑫于是,他决定在每个地方待上一段时间,到周边的集镇和乡村访问布道。经过努力,得以在广海、海晏和新宁城建立分堂。其中,以广海堂为最早,而海晏堂成为标杆。喜嘉理在开平的长沙塘、赤坎、马冈等地也建立了分堂。新会和恩平的教堂则主要由华人信徒开办。1885年,喜嘉理和助手访问了香山县,但香山经常有海盗出没,当地居民还“对真理怀有敌意”,传教活动屡遭打击。^⑬后来在伍赖信的进一步努力下,得以在石岐和榄边建立分堂,并且发展良好。其他地方如阳江的传教大约开始于1885年,在那龙建有教堂;顺德的乡村也开展了福传工作;客家拥有3个分堂,由伍赖信负责。^⑭

在学校教育方面,喜嘉理抵港后不久就开办了一所英语夜校和一所主日学校,招收不少学生。一年后,他在香港监管着3所学校,约160名男生;其中的教会学校则有90多名男生。学生每天约花一个半小时学习教义课程,其余时间学习政府教材。与此同时,在乡村地区试办了9所学校,由本地老师授课。^⑮1891年,美国公理会在香港开设的7所学校

(4所男校,3所女校)实现了男女同校。^⑥香港的学校还较早做到了自给自足,美国公理会只需提供老师,学校为老师支付报酬。同样,乡村开办学校的热情也很高。喜嘉理在1906年讲到:“我监管的19所学校里,除了2所在香港外,有17所在乡村,拥有328名学生,几乎所有学校都实现了自立。”^⑦广州的学校教育也较为突出。伍赖信在广州开办了一所男子培训学校,学员大部分都是教会成员;他的夫人珍妮(Jennie M. Nelson)则开办了女子学校。1914年1月,广州开办了一所男童小学及寄宿学校,招收了62名学生。还开办了一所华南女子学校,招收了72名学生,由5位老师授课。学校的宗教氛围浓厚,几乎每个女生在毕业之前都成为基督徒。^⑧此外,为适应各差会联合办学的趋势,美国公理会与其他差会联合支持筹建广州基督教高等协和神道学院以及广州私立协和女子师范学校,标志着华南地区的教育传教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医疗传教方面,喜嘉理初期在乡村地区访问布道时,发现发放一些帮助戒除鸦片瘾的药品,对传教工作很有促进作用。当时已经有一群中医福音派正在走访各个乡村,一边发放药品,一边宣传圣经,这让喜嘉理深感医疗和传教相结合的方式比起单纯的布道更受欢迎。他相信医疗传教既可以帮助加强弱势基督徒的力量,又可以树立良好的基督教形象,不失为一种传教良策。于是,他在1890年回美国调养期间,专门修读医科,并于1894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然后回到广东继续传教。作为医学传教士,除了参与广州的医院的医疗工作外,他还亲自到四邑一带的乡村发放药品。据称,在一个村子里,他一天之内为村民们拔了100多颗牙。他表示:“通常情况下,我不能接收大病患者,但很乐意实施小手术,因为任何成功的手术都比治疗慢性病所产生的印象会更好。在这个村庄发放药品和进行治疗,加上布道工作,是非常有趣和有益的,有几个妇女自愿成为基督徒。”^⑨

20世纪初,随着识字率的大幅提高、学校数量的

成倍增加以及受过教育的青年人数的大量增长,传教士们愈发认识到印刷教会读物的重要性。他们以教会学校为基地,大力开展印刷工作,编制书籍和传单,翻译教义材料,不仅快速有效地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还刺激了当地印刷业和印刷技术的发展。^⑩

四、美国华人基督徒对传教事业的参与和支持

通过上述努力,美国公理会在华南地区的传教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美国华人基督徒的鼎力相助,他们在加州—香港—广东的传教互动网络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华人基督徒除了请求和推动美国公理会派遣传教士到家乡传教以外,还在实践中与传教士携手合作,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传教工作,甚至在某些方面独当一面。有些人直接返回家乡,担任牧师、同工和教师等职务,有些人建立了免费学校,甚至建立各种专门的传教组织。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中国公理会传教士协会(The China Congregational Missionary Society)、图书借阅与福音布道协会(The Book Lending and Evangelizing Society)、母女传教士协会(The Mothers and Girls' Missionary Society)、社会救济协会(The Relief Society)、世界传教士协会(The World-Wide Missionary Society)等。^⑪

(一)积极筹款资助传教事业

美国华人基督徒将自己在美国务工的收入,不仅用于支持美国教会事业,还用于支持家乡的传教工作。1892年7月《传教士先驱报》载喜嘉理记述:“加州各教会共有161位华人基督徒,他们共筹得善款6290.40元,平均每人39.07元;他们为自己协会的开支筹款2029.90元,平均每人12.60元。他们还筹款1913.45元支持家乡教会,平均每人11.88元;同时筹款2181.20元支持外国传教,平均每人13.54元。”^⑫华人基督徒对美国公理会华南传教事业的捐赠非常可观,远远超过了美国公理会为此所提供的直接拨款数额,成为公理会在广东传教的重要经济来源。

1889年美国公理会年度报告称：“美国的华人基督徒已经为中国的福音工作筹集了2500元。”^②1890年，中国公理会传教士协会在新宁通过租借当地人的店铺开展福音传播工作，教堂的租金、布道者的薪水以及其他日常开销，全由中国公理会传教士协会承担。随着传教规模的扩大、信徒的增多，新宁的旧教堂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协会便在中国基督徒和美国华人基督徒中筹募了3000元，并借款1500至2000元，建立了一座新教堂。新教堂于1905年年底落成，开放时聚集了七八百人，这让喜嘉理备感欣喜。^③1892年，华人基督徒为在广州建立一座教堂而筹集了1900多元。^④1897年，为在新宁的庙边村建立一座教堂，美国华人尤其是翁氏家族进行了大量捐赠，用以购买建造教堂的土地。^⑤1897年至1901年的五年时间里，华南传道团筹集了10000多元用以资助香港的教堂建设以及相应开支，^⑥美国华人基督徒为此做了很大贡献。而来自香山的美国华人基督徒的特别捐赠，使香山的传教工作保持生机，并且能够年复一年地发展。伍赖信牧师在1906年谈道：“榄边计划修建一座供礼拜用的新房子，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这里的美国华人信徒的帮助。他们已经给我寄来了1300元银币，或约650元金币，并且还承诺再捐赠500元银币。”^⑦除此之外，在伍赖信的指导下，位于马萨诸塞州的福尔里弗中央公理教会中国基督教奋进会定期捐款至少100元，用以支持传教工作；位于康涅狄格州新不列颠南教会中国主日学校也为传教事业持续慷慨捐赠。^⑧

(二)人力物力支持学校教育

美国华人基督徒积极支持开办教会学校，有力地推动了家乡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一方面，他们为家乡的学校教育提供资金及人力。1897年，曾在加州受洗的美国华人翁挺生在喜嘉理的号召下，携带800多元的筹款回到家乡庙边村，筹办福音堂，开办义学校。几经周折，福音堂和义学校舍于1898年告成。继而，他们又在下南山村开设女学堂“灵磐家塾”。^⑨1901年，伍赖信夫妇结束在美国休假准备返

回广州时，美国华人信徒专门捐赠282元银币，支持伍赖信在广州建立学校的计划。^⑩到1906年，喜嘉理监管的19所学校的开支，绝大部分都由香港的学者和美国华人基督徒资助，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美国公理会的资金压力。同时，一些返回家乡的基督徒还帮忙照看当地的学校，有的担任教会学校的教师。另一方面，一些华人信徒因在国外见识到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教育理念，希望自己的亲人也能够接受这样的教育，于是把在家乡的亲人送入传教士开办的学校读书。《传教士先驱报》1888年7月载，美国公理会在新宁的Chu Ok村开办了一所学校，负责照看这个学校的是加州华人Jee Gam牧师的弟弟，当时大约有20名学生在该校就读。后来，喜嘉理决定将它办成一所免费学校，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两位加州华人基督徒将自己的儿子送入该校学习。在这所学校读书的学生，有一半的时间用来学习圣经。^⑪而在新宁的Tsun Kong村开办的一所学校里，入学的13名学生当中有两名女生，这对于当地来讲是件很新鲜的事情，因为那里从来没有女生上学之先例。其中一位女生的父亲，是一名美国华人基督徒。她进入学校读书认字，受到了全村人的赞赏。^⑫而美国公理会所办学校的毕业生，又反过来帮助教会教育事业。1916年，伍赖信谈到维持广州的男子学校，并在附近做一些家庭布道工作，为此向在檀香山的华人朋友寻求帮助。当时，伍赖信曾经的四位学生在檀香山担任牧师或学校教师，他们组织了一个小型委员会，尽其所能向伍赖信的广州学校提供援助。^⑬

(三)身体力行传道于父老乡亲

美国华人基督徒返回家乡以后，无论时间长短，都会尽力向亲戚朋友宣传信仰。喜嘉理到华南传教初期，得到两位从加州返回的基督徒李三和赖程的帮助，他们主要是协助传教士在新宁和开平巡回布道和发放圣经。在返回家乡从事传教工作的华人信徒中，陈遂昌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他于19世纪80年代在芝加哥皈依基督教，并在第一公理教会接受了

古德温(Goodwin)博士的洗礼。之后不久,他便返回了家乡,主要负责在新宁的海晏开展工作。陈遂昌颇富才干,在他的召集下,聚集了很多会众。^⑤1895年,喜嘉理再到香港居住,租屋设立福音堂,在此期间资助教友多人前往海晏陈遂昌处读书和学习宣道,学成后派往恩平、开平、新宁、阳江等地开设传教点。^⑥1904年,陈遂昌在香港被按立为公理宗教会的牧师,后来被差派到海晏堂工作,至1908年因病去世。^⑦陈遂昌在海晏工作凡20年,至其晚年,海晏堂在他的管理下已成为自立教堂,并且新建了美国公理会当时最大的教堂建筑,可容纳约700人,花费6000银两。^⑧另一位华人基督徒Fong Kat Loi以自己的影响力带动家人和乡亲信教。据喜嘉理讲述,“Fong Kat Loi是萨克拉门托第一公理教会的成员,四个月前回到中国,协助我一段时间了。我从他那里得知,他的妻子和一位寡妇已经放弃了拜偶像的习俗,并且几年以来定期守安息日。我们的弟兄向她们传授了基督教的真理,据他证明,她们对于基督教非常虔诚,并且愿意忍受迫害。”^⑨在广州,美国华人基督徒成立了一个“图书借阅与福音布道协会”,雇用人手在全省范围专门向教师和学者借阅或兜售教义书籍、科学小册子等,以在知识分子当中传播信仰。^⑩

(四)主动发起和管理自立教会

早在19世纪50年代,海外就有一些开明的传教组织领导人提出自立自传的主张,他们认为实现自立是传教的目的,反对在亚非拉地区新设立的教会长期仰仗西方差会,形成“母会”和“子会”的不平等关系。19世纪后期,一批具有民族气节的中方神职人员和信徒,开始表达摆脱西方差会控制、中国教会由中国教徒自办的诉求。1872年,陈梦南在广东发起基督教“自立”运动,在广州教徒和美洲华侨的资助下,自行租屋宣教,于1873年成立了“粤东广肇华人宣道会”,开创了华人自办教会的先河。此后,不断有爱国基督徒主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三自”(自立、自养、自传)理论逐渐成为新教传教运动中占

主流的传教思想,为来华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类似的探索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和可资借鉴的先例。同时,19世纪后期中国各地不断的反教风潮和20世纪初中国人日益觉醒的民族意识,也为基督教对华传教策略的转变提供了外在动力。^⑪

中国自立教会的实现得益于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会人士的共同努力,而美国华人基督徒功不可没。其中,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组织,即广州的中国公理会传教士协会(The China Congregation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anton)和香港的中华公理会堂(The China Congregational Church of Hong Kong),分别在美国华人Joe Jet牧师和翁挺生牧师的管理下独立开展工作。^⑫中国公理会传教士协会于1884年由华人基督徒在旧金山成立,目地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在家乡传教。协会由美国华人信徒独立组织和管理,接受美国传教士的监督和建,故该协会的美国华人信徒与喜嘉理、伍赖信等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中国公理会传教士协会一直践行支持家乡自立教会的初衷。至1905年,已经在新宁的广海、新会、恩平,以及开平的长沙塘等地建立了教堂。这些教堂都是自给自足,华南传道团并不提供资助。^⑬到1917年,该协会在华南地区已经拥有5个分堂,5所小学,并拥有数目可观的资产。^⑭

香港的中华公理会堂之前身,是1901年喜嘉理在楼梯街2294地段所创建的教堂,名为“美华自理会”。1903年,翁挺生接任美华自理会主任,成为第一位华人领导人,并在1904年被按立为牧师。翁挺生牧师致力于香港教会的自立,于1912年在会友中筹集20000元港币向美国公理会购回教堂全部产权,正式宣布其为华人自立教会,并更名为“中华公理会堂”。^⑮1916年,通过翁挺生牧师的努力和教会富裕会友的资助,中华公理会堂偿清了全部债务,甚至还有余额1000元港币用以维持日常开支。^⑯1919年,因加入中华基督教会运动,“中华公理会堂”再次更名为“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并逐渐成为美国公理会在华南地区的总堂,相继接管其他堂点。1925年,

广州及内地公理传教会同工聚于香港,共商组织“广东公理传道会”,以接收西方差会在广东的工作。1927年,广东公理传道会发起筹募10万元港币基金的运动,翁挺生牧师被推选为副主席,亲自前往美洲各地募捐。1929年,翁挺生牧师回港后正式成立“中华基督教广东公理传道会”,开始全盘接收美国公理会在广东的传教事业。^⑧

五、华人基督徒对中西文化的“双向传播”

人类既是文明的创造者,也是文明的传播者,随着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着碰撞和交流。明清时期天主教以及清末民初基督新教传教士的大规模来华,使“西学东渐”呈现出繁荣景象。与此同时,大量的中国经典及文化知识被传教士翻译或带入西方社会,造就了一批传教士汉学家,又极大地促进了“东学西传”。在此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遵循的是自西向东、再由东向西的传播路径,这里称其为正向性传播路径,亦是较为普遍的一种传播模式。近代以来,中外接触和联系的渠道大大扩展,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已不再是唯一媒介,宗教的联系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⑨出国华工、驻外使旅、商人及留学生等亦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而近代移民美国的广东华人,成为游走于中美之间的跨文化流动载体。^⑩他们不仅将中国传统文化带入美国社会,还将西方文化和理念传回祖国家乡,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传播者甚至领导者的作用。^⑪在此过程中,美国华人基督徒这一特殊群体发挥了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与传教士的传播路径相反,美国华人基督徒遵循的是自东向西、再由西向东的逆向性传播路径,促使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一种有别于传教士传播模式的另一番景象。

(一) 华人基督徒自东向西输出中国传统文化

大部分美国华人基督徒是在移民美国以后才逐

渐接触并皈依基督教的。与普通华人一样,他们携带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基因,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当地的社会生活。早期华人移民以从事体力劳动的广东华工为最多,主要集中于建筑、运输、采矿以及餐饮等行业。他们在饮食、服饰、建筑、艺术、语言、教育和民俗等各个方面,为美国社会注入了具有浓厚岭南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当地社会带去了粤菜、华服、岭南建筑、华文教育、华人社团、中医药知识、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以及中国民间习俗等等。通过他们,美国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有了深入和直观的了解。有些美国人被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吸引,进而学汉语、吃粤菜、穿华服、过华人的节日,甚至与华人通婚。

与此同时,他们在排斥与调和、坚守与妥协的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接收和汲取着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宗教信仰的选择上,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心理和现象。在19世纪中叶,华人劳工抵达加州后不久,美国的主流教派就建立了针对华人的传教点。传教士企图把华人基督教化,也努力使他们在文化方面美国化。但事实上,到19世纪末,在美国的华人接受基督教的比例并不高。喜嘉理于1894年提到:“当时约有80000个中国人仍然留在美国,但参加华人主日学校的不超过10000人,教会应该为未接收到福音的70000人做更多的工作。”^⑫即使是皈依基督教的华人,为了保持其族裔特性,往往保留着中文、中国传统服饰装扮和饮食习惯,并且有选择性地遵循中国传统习俗,例如,他们重视农历新年(春节)、中秋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当然,作为基督徒,他们会尽可能回避这些节日中带有“异教”或拜偶像色彩的仪式,并且远离如清明节、盂兰盆节(鬼节)等敬鬼神的节日。同时,他们仍然秉持儒家道德伦理中的“仁”“孝”观和节制、勤俭等现世的苦行主义观,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中华传统价值观与基督教信仰不仅不相冲突,还在某种意义上与之相通和互补。^⑬

美国华人基督徒在美国人、华人移民和基督徒

的三重“身份认同”中,大体秉持一种整合型的文化价值观。他们努力在两种文化之间寻求平衡,试图在皈依基督教以后仍不丢弃中国传统文化。于是,他们融合了两种文化特性,塑造出一种新型的具有浓厚华人特质的基督教文化团体,即华人基督教会。华人基督教镶嵌于世界基督教网络之中,是基督教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基督教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使其在向华人宣教的过程中淡化了西方宗教色彩,在情感上与文化上更容易与华人移民亲近,使他们产生一种符合心理需要的族群归属感。^⑤正是由于华人基督教会独特的种族性和保守的神学观念较为符合华人的心理,从而无论是对海外华人还是家乡华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华人基督教会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产生的新型基督教社会和文化团体,帮助其成员有选择地保持一些经过创造性解释的华人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社会的宗教信仰和价值理念。

(二) 华人基督徒自西向东传播西方文化

美国华人基督徒即使信仰了上帝,也割裂不断龙的血脉,更无法割舍对祖国家乡的情感和眷恋。与普通华人一样,为了寄托和表达这份思乡之情,华人基督徒不仅刻意保存一些传统的生活习俗,更不遗余力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等方面与家乡保持着密切互动,为家乡带回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生活方式,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同时,对于这些世俗性的支持而言,作为华人基督徒,他们深感自己在美国接受的基督教信仰乃是“无价之宝”,可以帮助祖国同胞获得灵魂上的救赎,甚至可以改造国民的精神世界。因此,他们视教化中国为己任,积极呼吁甚至返回家乡协助传教士传播福音。由此形成的基督教传播的互动网络,极大促进了西方思想、文化、科技、艺术在近代中国的生根与发展。从有形到无形,从微观到宏观,我们可以观察到西方文化以广东为起点,对中国社会的浸润、影响甚至改造。

首先,引进了西方建筑文化和艺术。建筑是最

能见证历史、传承文化的有形载体。19世纪后期,在广东的侨乡如台山、东莞、恩平、阳江、新会、佛山等地,相继出现了用侨汇修建的中西合璧的楼房群落,包括具有巴洛克风格的碉楼建筑群、教堂、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和慈善机构等。这些新式建筑群结合了中西方建筑的风格和特色,大胆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采用了更加先进的建筑材料,成为侨乡亮丽的风景线。一批华侨教徒从美国返回广州后,在珠江南岸(现海珠区,俗称“河南”)建起基立村,供基督教徒生活。村内别致豪华的幢幢洋房,大多按照西欧古老别墅形式建成,俨然一个具有东方韵味的西式小镇。^⑥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开化之风,最早从华南一带,逐渐向全国伸展。

其次,促进了近代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华人基督徒已经认识到,要使中国摆脱困苦免遭屈辱,就必须加快近代教育的步伐,废除陈旧的教学体制和繁冗的教学内容,开设经世致用的新式课程,培养具有近代科学知识和世界眼光之人。为此,他们大力支持家乡开办教会学校,修建图书馆和阅览室,招收男女学生,培养知识分子。例如,伍赖信开设的广州华南女子学校,课程包括缝纫、刺绣、绘画、音乐、植物学、地理、数学、英语、体育、生理学及圣经。^⑦这些课程的设置与中国传统课程相比,极具多样化和实用性,对于培养综合性人才大有裨益,更有助于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向世界靠拢。这无疑体现了美国华人基督徒积极提倡教会兴办教育、借教育以救国的想法。

最后,华人基督徒团体成为近代民主平等思想的传递者之一。美国华人基督徒深受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较早具有创新和改革精神的人士,这种精神也成为广东的文化基因,使广东在中国近代史中显得朝气蓬勃。有些先进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如孙中山先生,携同美国檀香山兴中会的华侨,包括一些华人基督徒,积极投身反对中国传统的等级制度和腐朽的封建帝制。他们在帝国主义殖民入侵、封建王朝即将崩溃之际挺身而出,致力于祖国

的变革事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促进了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

六、结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美国公理会复兴华南传教事业的动因、过程和结果来看,美国华人基督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⑩如果没有华人基督徒的鼎力支持和全面协助,美国公理会在华南的传教事业将难以为继。华人基督徒有效地建立起了传教士、美国华人与华南地区家乡之间多向互动的宗教及文化传播网络。

表面看来,华人基督徒与传教士所持有的目标、方式和结果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传教士向在美国的华人传教,除了关注华人的基督教化,更重视通过他们将基督教带入中国本土。华人基督徒从传教士那里吸收了基督教化中国的思想,他们除了需要融入当地生活以外,也在寻求重返家园传播基督教的路径。在具体的传教活动中,华人基督徒和传教士所采取的方式亦大致相同。在此过程中,二者互为纽带,相互依存。

但若进行更深层次的考察,可以看出华人基督徒和美国传教士在华南地区的传教过程中,貌似“同床共枕”,实则“同床异梦”。从背景来看,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是建立在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基础之上,依仗帝国主义殖民入侵和签订不平等条约才得以打开中国大门;而华人基督徒在家乡传教,是在祖国衰弱腐朽和遭受殖民入侵进而以求革旧立新的背景下进行的。从目的来看,美国传教士希望通过引入基督教和西方政治,实现中国基督教化和美国化;华人基督徒则是心系祖国家乡的命运和安危,寄望于以传播西教来带动西方政治与科学在中国的实施,以求挽救民族危亡。与在美国的华人基督教会一样,华人基督徒即使将基督教传回家乡,也极力推动和促使中国教会自立以摆脱外国差会的控制,从而实现基督教中国化。一为教化与改

造,一为救亡与革新,这是美国传教士与华人基督徒在目的和立场上的本质区别。

注释:

①赵晓阳:《逆行与承继:新西兰华工与广东家乡的传教互动》,《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5期。

②参见吴宁:《没有终点的到达:美南浸信会在华南地区的传教活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

③岳志强:《“文化传播”理论视角中的传教士与美国华人社会(1848-1900)》,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26-27页。

④邱燕娜:《美国华人信仰基督教的历程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6页。

⑤岳志强:《“文化传播”理论视角中的传教士与美国华人社会(1848-1900)》。

⑥*The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1904, Vol. 17, p.386.

⑦岳志强:《“文化传播”理论视角中的传教士与美国华人社会(1848-1900)》。

⑧*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ission*, 1883, Oct., Vol. 73, p. 79.

⑨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与教育活动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12页。

⑩"What Congregationalists are Doing for the Uplift of China", *Envelope Series(Quarterly)*, 1907, Oct., Vol. 10, No. 3, p.44.

⑪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80页。

⑫*The Missionary Herald*, 1884, Apr, Vol. 80, No. 4, p.139.

⑬*The Missionary Herald*, 1886, Jun, Vol. 82, No. 6, pp. 224-225.

⑭*The Missionary Herald*, 1913, Jun, Vol. 109, No. 6, p.257.

⑮*The Missionary Herald*, 1884, Aug, Vol. 80, No. 8, p.307.

⑯*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ission*, 1891, Oct, Vol. 81, p.69.

⑰*The Missionary Herald*, 1906, Aug, Vol. 102, No. 8, p.392.

⑱*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ission*, 1915, Oct, Vol. 105, p.179.

⑲*The Missionary Herald*, 1896, Jul, Vol. 92, No. 7, p.289.

②①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ission*, 1921, Oct, Vol. 111, pp. 118-119.

②② *The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1904, Vol. 17, p.386.

②③ *The Missionary Herald*, 1892, Jul, Vol. 88, No. 7, p.280.

②④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ission*, 1889, Oct, Vol. 79, p.19.

②⑤ *The Missionary Herald*, 1906, May, Vol. 102, No. 5, pp. 212-214.

②⑥ *The Missionary Herald*, 1892, Jul, Vol. 88, No. 7, p.281.

②⑦ *The Missionary Herald*, 1897, Jul, Vol. 93, No. 7, p.295.

②⑧ *The Missionary Herald*, 1902, Jan, Vol. 98, No. 1, p.24.

②⑨ *The Missionary Herald*, 1906, Apr, Vol. 102, No. 4, p.180.

②⑩ *The Missionary Herald*, 1921, Jun, Vol. 117, No. 6, p.215.

③① 王震廷:《致弟兄姊妹的家书(一八年六月份)》,《公理之故事》2018年第647期,第2-3页。

③② *The Missionary Herald*, 1901, Nov, Vol. 97, No. 11, p.450.

③③ *The Missionary Herald*, 1888, Jul, Vol. 84, No. 7, p.309.

③④ *The Missionary Herald*, 1890, Jul, Vol. 86, No. 7, p.286.

③⑤ *The Missionary Herald*, 1916, Oct, Vol. 112, No. 10, p.444.

③⑥ "What Congregationalists are Doing for the Uplift of China", *Envelope Series(Quarterly)*, 1907, Oct, Vol. 10, No. 3, p.46.

③⑦ 雷雨田主编:《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第346页。

③⑧ 王震廷:《致弟兄姊妹的家书(一八年六月份)》,《公理之故事》2018年第647期,第3-4页。

③⑨ "What Congregationalists are Doing for the Uplift of China", *Envelope Series(Quarterly)*, 1907, Oct, Vol. 10, No. 3, p.46.

③⑩ *The Missionary Herald*, 1886, Jan, Vol. 82, No. 1, p.23.

④① *The Missionary Herald*, 1892, Dec, Vol. 88, No. 12, p.517.

④② 吴义雄:《开端与进展:华南近代基督教史论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6-137页。

④③ *The Missionary Herald*, 1917, Sep, Vol. 113, No. 9, p.399.

④④ *The Missionary Herald*, 1909, Jun, Vol. 105, No. 6, pp. 232-233.

④⑤ *The Missionary Herald*, 1905, May, Vol. 101, No. 5, p.249.

④⑥ *The Missionary Herald*, 1917, Sep, Vol. 113, No. 9, p.399.

④⑦ 参见《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简史》,网址:http://www.ccc.org.hk/content_page.php?p=74。

④⑧ *The Missionary Herald*, 1918, Apr, Vol. 114, No. 4, p.190.

④⑨ 王震廷:《致弟兄姊妹的家书(一八年六月份)》,《公理之故事》2018年第647期,第4页。

④⑩ 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2-123页。

⑤① 赵欣:《近代旅美华侨华人与中美文化的双向交流》,《史学集刊》2007年第4期。

⑤② 刘世红:《广东华侨华人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⑤③ *The Missionary Herald*, 1894, Jun, Vol. 90, No. 6, pp. 242-243.

⑤④ 参见李爱慧:《美国华人基督教会的族裔特性探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⑤⑤ 密素敏:《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基督教——以北美和东南亚为例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

⑤⑥ 何道岚、林亦旻:《清末基督社区安置归国华侨》,《广州日报》2013年7月31日,第A22版。

⑤⑦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ission*, 1915, Oct, Vol. 105, p.179.

⑤⑧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ission*, 1898, Oct, Vol. 88, p.90.